

思旋天地

自二零零五年始，《文匯報》開創了「未來之星同學會」，可謂愈辦愈精。

「未來之星同學會」，可謂愈辦愈精。今屆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及「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的「2015暑期交流團」，如「從香港出發——江蘇家園情懷之旅」參訪團，參與同學除可了解當地文化外，也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日軍侵華是中國人永不磨滅的傷痛，下一代多走訪歷史舊地，從而理解上一代的苦。

行萬里路了解祖國

「一帶一路」經濟為中國重要戰略，深度加速亞洲崛起，中國勢成經濟火車頭。同學單靠看書、看報章雜誌，片面地了解今天的中國，已不合時宜。走進去，放下既有概念，學習用內地方式，由內向外看香港、看內地、看世界，體會更新也更深。

現在要阻止「港獨」蔓延，教育下一代正確認識歷史才能為香港種下福祉。

隨想隨興

無錢有個半小時的節目，名叫《望子成才

「美國篇」，從八月二十五日起，每逢星期四晚播出，共十三輯。我看了第一輯，是吳錫輝訪問梁錦松，以及他和馬時亨一起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李效良教授。其中還穿插了一段吳錫輝妻子鄧蕩蕩談到她和兒子去參加小提琴比賽，兒子未被選上的往事。幾段訪談，都令我產生感觸，思過起伏。

望子成才

李效良說到美式教育和香港的不同，就是在小學一年級時，先不要選科，大膽嘗試去自己的興趣，下一年再決定，而且考不及格也不要緊，成績單上不會顯示嘗試的失敗。反觀香港的中小學畢業生，今年聯考成績最好的幾個，不是選擇醫科的未來嗎？這決定是否太早了點？

梁錦松在訪談中說到，要成才，不單要靠學識，還要有素養和價值觀。素養的建立，必須靠課外活動來培養，像領導能力和從失敗中汲取教訓，不怕做錯，只怕錯而不改，這些都不是課本能提供的素養。價值觀也是，如果天天從媒體上看到的，都是賺多少錢、炒多少股才能買得起房子，我們的價值觀就只能停留在「財」字上了。

穿行在漢字的優美中

琴台琴瑟 伍采采

數年前，我停下正在經營的公司，選擇幽居在山腳下的村莊裡專心閱讀和寫作。時至今日，為了把自己的作品完整地搬上銀幕，又啟動了公司的運作，成日在外奔波，如此帶來的結果便是減少了閱讀量和寫作量。

「叛逆者」，而在我看來，他們倒是漢語書寫的捍衛者、堅守者。我用了「捍衛」、「堅守」這一大詞，好像與木心先生一般不用大詞的寫作風格相悖。這僅僅因為我覺得漢語寫作已用了一個很危險的境地，一方面借助互聯網的方便，似乎人人都可以成為「作家」；另一方面，正因為這種便捷使得文字書寫變得沒有門檻。無論誰都打着創新的旗號，朝裡面塞進各種五花八門的東西。若是木心先生還在，在今天的網絡上讀到一篇漢字裡摻雜了阿拉伯數字、英語甚至火星文，大約也不會感到驚訝，因為這些把寫作當作娛樂的人們，本來對我們的漢語就沒有什麼尊崇。這些年，一直有一些較真的作家、教授呼籲「保衛漢語」，這都不是空穴來風，實在是我們已經把漢語糟蹋得不成樣子了。

難得一個微雨夜，坐在書房，泡一壺茶，想在清涼的山風裡找回往日的快樂。打開前不久在香港書展上網絡作者所送的幾本未曾開封的新書，每一本都不例外，翻上一兩頁便讓人打消了讀下去的慾望，只好再從書架上選了一本木心先生的舊書，讓自己迅速地沉浸到他優美的文字裡。

當然，對漢語的破壞絕非始於當下，從本質上說五四廢掉文言文，使用白話文，已經從根本上把兩千年的文字、語法都割斷了，這在世界語言史上也屬罕見。木心先生在八十年代去了美國，遠離吾土，卻也催生出他的許多至簡至美的文字。比如他「朝夕相對的是新聞紙包起來的地球」，他說「我是病人/你有病的醫生/反之亦然」，在木心先生的眼裡，新的建築不說話/舊的建築會說話。

從木心先生一輩的寫作者的文字中，我讀到的是簡約，是留白，是含蓄。這對於網絡時代無節制的寫作，似乎已是一種反動，所以有人把木心先生和他的學生稱作「叛逆者」。

或許，這只是我為了在一個閱讀與寫作都日益凋敝的時代，讓我自己找到一點堅持的理由罷了。

目連嗜頭

目連原是傳說中的人名。目連之母不仁，死後被打入地獄；目連至孝，不念其母在生之日只顧自己享樂不顧兒子死活的舊惡，不忍其母在地獄受苦受難，遵照佛陀之教示於七月十五日建「盂蘭盆會」，供養十方僧眾以超度其母擺脫無邊之苦海。

靜，遠遠地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我曾推測，明代的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說到目連戲時，也一定寫過目連嗜頭。但推測終究只是推測，他那篇總共347字的《目連戲》並沒有說到目連嗜頭。那「目連戲」是由「徽州旌陽戲子」演出的，不是紹興大班。「紹興大班」即劇團要到清咸豐、同治年間，方才以「紹興亂彈」之名時興起來，目連嗜頭在那個時候大概也尚未問世。但「凡天神地祇、牛頭馬面、鬼母喪門、夜叉羅刹、鋸磨鼎鑊、刀山寒冰、劍樹森羅、鐵城血濺，一似吳道子《地獄變相》，為之費紙札者萬錢，人心惴惴，燈下面皆鬼色」，我從張岱的這種字裡行間，還是感受到目連嗜頭與那個氛圍十分相稱。

余生也晚，沒有見過目連戲，「喪家做道場」卻是見過的。按照迷信的說法，人一死，就得超度亡靈，道士承擔的大概就是這種使命。他們一律道冠道服，手持各式樂器，可見一身二任，也兼着吹鼓手的。紹興的風俗，出葬時要擺「路頭儺」，這該是「道場」的重頭戲。一片哭聲中抬出的棺材停放在早已擺在路口的兩條平行的長凳上，棺材上端放着一杯「上路酒」，棺材前燒着紙錢，為首的道士居中，口中唸唸有詞，不知是在替死者還是替活人懺悔，這架式卻有點像現在的致悼詞。或許是以壯死者之行色罷。懺悔一畢，材腳（抬棺材的腳伙）便舉起「鐵頭踩柱」，一下打碎了擺在棺材上的酒杯，二支目連嗜頭一齊響起：「哪，哪，哪——」，這後面的「哪」是高八度的，聲音也拖得特別長，因而就顯得格外悲愴、淒厲。據說，這正是鬼出場的時

候，「活無常」出來了，「死有分」（我們叫「死無常」）出來了，他們是來把死者帶入地獄的。於是哭聲再起，哭聲中，四個材腳（大戶人家的或許加倍）抬起棺材緩緩而行。前面由兩面銅鑼開路，頭頂三梁冠、身着麻布衣的兒子捧着牌位，後面是同樣披麻戴孝的女眷，有的蹣跚捶胸，有的撲向棺材，而戴獨梁冠、穿白大衫的孫子，則早已手捧裝了菜餚的小鉢跪在村口、橋頭，恭候棺材從他身上抬過去。那場面，使身歷其境的悲痛萬分，也使路邊旁觀的目不忍睹。

祖父去世的時候，我家做過道場，擺過路頭儺，因而，我也曾領略過目連嗜頭道場氣氛的功力。祖母去世的時候就沒有這樣的場面。那時我正下放閩東，接到噩耗時已過二七，未能趕回，而我的父親則正在受審查，尚未獲得自由。據說，他曾交代家裡的人，出葬時，一出家門就不許再哭，於是就將悲痛一概埋在心中。其實，那個時候，即使父親不受審查，道場和目連嗜頭是不會再有的，它們也被當作「四舊」革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同迎親時毫無差別的鑼鼓聲和唢呐聲，連噴唢的調也和迎親時一樣，是那支叫做《學大業，趕大業》的輕快而跳躍的吹奏樂，實在叫人哭笑不得，不知是喜是悲。如今，福州人送葬時，常常吹奏的是那支叫《世上只有媽媽好》的曲子，倒是沒有留意，如果去世的是父親，是否也用這支曲子送別？

我曾在一篇說「諱忌」的短文中說：「這諱忌開始時的本意，大概是為了維護節日喜慶的氣氛，歡樂的情緒，盡量少說些煞風景的事。以後才逐步編造出一套神秘的話來，……於是諱忌也就成了一种迷信。」道場之類的演變，與這「諱忌」興許是差不多的。道場原先也不過是喪葬時的禮儀，道士也只是喪葬時的吹鼓手。之所以採用目連嗜頭，因為那聲調的悲涼激越，很符合喪葬時的氛圍，鬼域、地獄與亡靈是日後編造和嫁

目連嗜頭是紹興方言。紹興人所說的「嗜頭」是一種樂器，是一種特別加長的號筒，既不同於喇叭，也不同於唢呐。清代范寅《越語》說這種叫「嗜頭」的樂器「銅製，長四尺」，並說這種嗜頭「道場及召鬼戲皆用，目連戲為多，故名」。我們這一代已很少有人見過目連戲了，戲曲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卻是天南地北無幼皆知的，因為也是紹劇，「哪，哪，哪——」地一吹，氣氛立即肅然；鬼，就要出場了。

這種「道場及召鬼戲皆用，目連戲為多」的樂器，就是目連嗜頭。紹興籍的作家，多有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過目連嗜頭的。魯迅在《無常》一文中說：「這樂器好像喇叭，細而長，可有七八尺，大約是鬼物所愛聽的罷，和鬼無關的時候就不用；吹起來Nhatu、Nhatu地響，所以我們叫它『目連嗜頭』。」魯迅說的尺寸，比范寅說的要長三四尺，大概只是童年時的記憶。柯靈在《關於女吊》一文中說：「那是一種很奇特的喇叭，頸子細長，吹奏起來，悲涼而激越，鄉下人都叫做『目連嗜頭』，似乎是專門號召鬼物的音樂，目連戲以外，就只有喪家做道場才用它，夜深人

百家廊

宋志賢

接的。民間喪葬習俗的改革，應該革去的是這些編造和嫁接上去的東西。弄神弄鬼地超度亡靈，確實也虛妄得很。然而，喪葬時那種悲痛的氣氛是未必要革去的。當熱則熱，當冷則冷，當喜則喜，當悲則悲。全盤否定，徹底是徹底了，卻未必高明。我想，在那種場合下，吹目連嗜頭絕對比吹唢呐來得得體。至於如今有些地方的民間喪葬，悲痛不足而迷信有餘，添加什麼紙別墅、紙汽車以至於紙二奶之類，就更是離譜了。

母親離開福州回老家前曾有交代，到了那一天，道場要給她做的。十年前，在她去世的時候，我比少年之時更為真切地領略了因為目連嗜頭的渲染而營造更為悲愴、淒厲的氣氛。但與少年之時不同，我那時已經沒有了恐懼，也沒有了那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倒是很詭異冒出一個念頭：人死之後能成為鬼，興許是人類的一個美好願望。在為母親守靈時，我就這樣想：如果人死了後能成為鬼，母親此時已與父親團聚，或許還見到了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我們自己也總有一天能與自己的先人相見。

這十年來，每當母親的忌日那天，我都會在電腦上看母親的喪事之錄像，於是又聽到目連嗜頭悲愴、淒厲而又悠長的聲音，於是又沉浸在那種肅然的氣氛之中。



目連嗜頭 網上圖片

真正體育精神

這屆里約奧運，給觀眾帶來意外的開心片段，倒不是看哪個國家、哪個運動員得了哪一項的冠軍，也不是誰誰誰破了世界紀錄，因為這些情節，常見於任何大型體育運動，大不了一看贏了冠軍的開心到哭謝爸爸媽媽，輸了冠軍的傷心到同樣哭對不起爸爸媽媽。

而最讓人眼前一亮的，這小妮子接受訪問時亦裸裸全無功利心，那種天人一樣的反应，色純真到教全世界不願五顏六色種族、不同政治立場的觀眾，都為她無邪輸送出來的正能量而喝彩。全球觀眾自身久已隱蔽的正能量同時也因小傅引發出來，成為自有奧運以來未有過的溫馨插曲。事前小傅的嘻嘻哈哈，可愛在不因勝敗而發，只是坦然隨本性表現出為參賽而參賽的喜悅，要不是記者告訴她，還茫然不知道自己得了銅牌，更可愛在知道以後，也只不過顯露出平常心的一陣驚喜。

此外，最後一場女排大賽，中國隊闖別雅典奧運金牌十二年後再次摘金，要是直接落得二十五分挫敗對手就平平無奇了，精彩在事前慘輸一局，眾女將以哀兵奮勇精神出擊，連連三局而逆轉取勝。朱婷說自己一生最幸福是給「像媽媽一樣溫暖」的郎平教練選入隊中，從她那句感性直白，便體會出女排團隊關係的融洽與和諧；而郎平坦言以這個愛徒超越自己為榮，也同樣不失為「師長風範」。大會如增設「奧運團體精神獎」，國家隊的傅國慧、朱婷和郎平該拿定三冠軍了。可知道金牌一旦涉及國家榮譽和個人利益，「體育精神」每每便在選手勝敗時容易流失，你說我們的傅國慧/朱婷/郎平的表现多亮麗！

體育精神不止見於選手和教練，也見於場外的觀眾者，這幾年無數次不同國家、不同類型的足球大賽觀眾席上的騷亂，給人留下的惡俗印象就教人搖頭了。

然而，由於上述途中遭綁架時年約十歲（十歲），她承認在被禁數個月後，她開始請求誘騙者擁抱她，而隨著年齡長大，她可離開地下室到男人的床上同睡，卻被鎖鎖住。之後，男人偶爾帶她出外用膳……這「經歷」雖然慘無人道，但因為習慣和恐懼，她不敢（甚或不願）逃走。即使逃出來後，該男子已畏罪自殺，她潛意識中會想起他相處的日子，甚至買下他們一起生活的房間。心理學家們將這種現象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抖室》是該片女編劇艾瑪·多諾霍 (Emma Donoghue) 根據自己發表於二零一零年同名小說改編，我不知道，她寫小說時是否看到上述新聞並獲得靈感，但她顯然選擇了明辨是非的正反面。

中國女泳將「奧運火雞姐」傅園慧，在賽後接受訪問時，激動誇張的表情，「我有這麼快嗎？我已做出了洪荒之力。」一語成金句，瞬間爆紅。

傅園慧地書包無人探究，畢竟只是運動員。我不是許星，我是運動員，居然因為一些奇怪的東西，上了搞笑排行榜。」

今天是在娛樂文化時代，稍有點娛樂性話題，或者帶點逆常元素，也可以成為焦點。好像香港的「寒戰II」，方健儀演出女警一角，甫一出場，觀眾都笑了，方健儀是來自新聞界，突然變了電影明星，完全不同的界別，從現實專業到夢工場，帶點逆常元素，也有了意外的驚喜。

互動的情感

少女被騙被拐的故事不時聽聞，她們像電影《抖室》的五歲男孩，他從出生都米的天日，整個世界和活動空間就在十平方米房間，當他走出房間時，對陽光和樹木既感到好奇，也有點害怕，對陌生人亦然。幸好，畢竟才五歲，赤裸裸而來，沒有比較，也沒有心理負擔，不像媽媽、男孩較勇敢。這個意外的生命，也不是支撐母親活下去並逃出去的動力，也彷彿成為母親走出心理陰影的指路燈——他叫外婆把心愛的頭髮剪下來，作為給媽媽的「力量」。

電影主角的遭遇當然很慘，幸好編導把角度放在如何戰勝逆境和克服心理陰影上，以許多細節來描寫受害者如何「苦中作樂」，比如母子在浴缸中戲水，在地上做體操，跟想像中的小狗做朋友等等，一種相依為命又互為依存的母子情感，以及由純真的孩子主導的鋪排，構成了人性本善但生命無常的本質。

《抖室》的故事絕非偶然。十年前在奧地利，也有一位女子娜塔莎·坎普希被禁錮在五平方米地下室長達八年後逃出生天。她逃出來後將這段經歷寫了一本《3000天》，披露每周被打兩百次，被打到骨折，還被剃光頭髮和被強迫裸體做家務，稍發出痛苦的聲音，男人就扼住她的喉嚨或把她的頭壓入水缸中……

方寸

中國女泳將「奧運火雞姐」傅園慧，在賽後接受訪問時，激動誇張的表情，「我有這麼快嗎？我已做出了洪荒之力。」一語成金句，瞬間爆紅。

傅園慧地書包無人探究，畢竟只是運動員。我不是許星，我是運動員，居然因為一些奇怪的東西，上了搞笑排行榜。」

今天是在娛樂文化時代，稍有點娛樂性話題，或者帶點逆常元素，也可以成為焦點。好像香港的「寒戰II」，方健儀演出女警一角，甫一出場，觀眾都笑了，方健儀是來自新聞界，突然變了電影明星，完全不同的界別，從現實專業到夢工場，帶點逆常元素，也有了意外的驚喜。

萃神

這一屆里約奧運，給觀眾帶來意外的開心片段，倒不是看哪個國家、哪個運動員得了哪一項的冠軍，也不是誰誰誰破了世界紀錄，因為這些情節，常見於任何大型體育運動，大不了一看贏了冠軍的開心到哭謝爸爸媽媽，輸了冠軍的傷心到同樣哭對不起爸爸媽媽。

獨家

少女被騙被拐的故事不時聽聞，她們像電影《抖室》的五歲男孩，他從出生都米的天日，整個世界和活動空間就在十平方米房間，當他走出房間時，對陽光和樹木既感到好奇，也有點害怕，對陌生人亦然。幸好，畢竟才五歲，赤裸裸而來，沒有比較，也沒有心理負擔，不像媽媽、男孩較勇敢。這個意外的生命，也不是支撐母親活下去並逃出去的動力，也彷彿成為母親走出心理陰影的指路燈——他叫外婆把心愛的頭髮剪下來，作為給媽媽的「力量」。

電影主角的遭遇當然很慘，幸好編導把角度放在如何戰勝逆境和克服心理陰影上，以許多細節來描寫受害者如何「苦中作樂」，比如母子在浴缸中戲水，在地上做體操，跟想像中的小狗做朋友等等，一種相依為命又互為依存的母子情感，以及由純真的孩子主導的鋪排，構成了人性本善但生命無常的本質。